

冀東報史資料

專輯之三

旁劫通訊(增刊)

冀东报纸史料（专辑之三）

编辑者：唐山劳动日报编辑部

出版日期：一九八三年七月

本期文中楣花 王大耀



↑ 《冀东日报》印刷厂全体职工由遵化县迁到唐山近郊屈家庄时，召开全体大会。右立讲话者为当时厂工会主席阎毅同志。
(贾贺兰供稿)



← 一九四九年秋，唐山暴雨成灾，陡河两岸工厂被淹停产，本报记者与工人一起在启新水泥厂内与工人一起抗洪抢险。

11/06/1949



↑ 《救国报》滦西分社的同志1945年5月在盘山千象寺附近开荒
(叶田摄)



← 《救国报》滦西分社的同志在联合村
前帮助乡亲栽白薯。
(叶田摄)

目 录

史 救 料 国 报	回忆《救国报》滦西分社……………王雪松 (1)
	回忆我在《救国报》工作的日子 ……………柳 达 (21)
	忆滦东《救国报》二、三事……………王省汉 (28)
关于编辑出版《国防最前线》几点回忆 ……………山 桥 (42) 活跃在长城的文艺轻骑兵……………王雪松 (45) ——回忆《搏斗》社	
冀 东 日 报 史 料	回顾《冀东日报》……………吴 明 (53)
	回忆唐山解放前后时期的 《冀东日报》……………岳 欣 (68)
	沸腾的冀东……………白 璞 (78)
	在《冀东日报》工作的日子…金 涛 (88)
	《冀东日报》始末……………肖 铃 (97)
报海拾遗：漫话《冀热辽日报》……………肖 铃 (114)	
征集冀东报纸史料启事 …………… (120)	
报史照片 (五幅)	

回忆《救国报》滦西分社

王雪松

抗战时期，冀东党的机关报是《救国报》（当时冀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冀东地区委），创刊于1940年。处于敌人远后方，国防最前线的冀东地区，敌我斗争非常激烈、艰巨。尤其1942年至1943年，日寇搞五次“强化治安”，对冀东实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而冀东抗日军民经过几年的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直到1943年以后，逐步收复了被敌人“蚕食”的地区，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冀东地区委扩大为冀热边特委，下辖五个地区委。冀东西部为第一地区委；1944年2月，成立了《救国报》滦西分社——第一地区委的机关报，出版《救国报》（滦西版）。滦西分社的诞生成长，曾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

大红峪《救国快报》

1942年秋，日寇在冀东的“强化治安”活动越发疯狂。尤其在冀东西部将矛头指向盘山和蓟县，平原地区几乎全部被蚕食；盘山也只有丁福顺的“盘山班”坚持残酷斗争。这时，组织上调我上山，坚持工作。蓟宝三联合县县委高昌指示我：环境越紧，越要加强宣传工作，依靠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坚决粉碎敌人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阴谋。

我接受了任务，独自来到桑树鞍、大红峪。开始翻印了两期《救国报》，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逐渐同群众熟悉，并建立了两户堡垒关系，虽然天天跑敌情，总算扎了根。十月底，天气渐渐地冷了，敌人集结兵力，进山实行残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驱使由平地圈来的成千上万老百姓身带大镐的“大镐队”；敌人将桑树鞍、大红峪一带的房子全行烧毁，大镐队刨倒房山、坝台坎，砍伐山林树木。无家可归的老百姓被敌人圈下山去，集家并村。在这环境异常残酷时，高昌同志在瓦房峪战斗中负伤了。担架抬到大红峪，已将半夜。我带着沉重的心情，来到高昌同志身边，看望他的伤情。他见我来了，向我关心地说：“雪松啊，你要提高警惕性，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平地通往黄屯、太平沟根据地唯一的交通要道就只这一带了，组织上相信你能担当这一重任。”并给我一张百元的“大备票”，做为工作费用。我依恋难舍地望着高昌同志被担架抬走了。

从此，环境越来越紧了。在这环境险恶的狭小地区活动，日夜跑敌情。我同桑树鞍一家堡垒户崔大娘的儿子——崔盛，结为生死弟兄。崔盛担任这村自卫军（即民兵组织）中队长，比我小两岁，称我为哥。崔大娘家的房子被烧后，老小三口集到翟庄去住。崔盛坚决不下山，我们患难与共，形影不离。白天扎在山林里隐蔽；夜间住在山洞、炭窑里。崔盛点松明子照明，我编写宣传材料。稿子来源是附近几村党支部负责人，如：大红峪的白恩、桑树鞍的李福贵、翟庄的岳华等同志经常找我汇报群众反集家斗争的情况；同时，设立了秘密交通站，确定桑树鞍的李景芳担任交通员。来往转送报纸、信件。不但信件畅通，从而所获得的消息也比较

广泛。我写成稿子及时刻印。当时不便使用油印机，只靠崔盛二拇指蘸油墨往腊纸上抹，一行行地印在小块白纸上，叫做《救国快报》。为扩大宣传，还翻印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的宣传品。每次只印几十份，然而发到集家村去，鼓舞了群众抗日斗争情绪，坚定必胜信心，对坚持地区却起到重要作用；有时《快报》传进据点，更加震慑了敌人。

一进腊月，天寒地冷，滴水成冰，没有住处，又缺吃少穿，困难就更多了。下营、杨庄、城下、川芳峪等处敌人频繁围攻、扫荡这一带山地。这时候，为便于工作，李景芳同我一起活动了。敌人不分昼夜进山，尖山子背后陡碰上的是一个狼洞，成了我们经常住居的“保险地”。情况稍缓和时，我们从山上打来山草，找地势隐蔽的炭窑，把草塞进窑里烧着，等灰火燃尽，我们钻进窑里过夜，暖烘烘浑身冒汗。崔盛管这办法叫做“烧霸王炕”。再就是大红峪东沟宋大爷家也是我们的常住地。宋大爷名叫宋继均，老俩口所生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一家老小七口。大女儿出嫁到王庄子，女婿是小区工作人员，敌人扫荡时，与敌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后来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先后参了军。宋大爷、宋大娘我们同仇敌忾，患难相助。宋大娘是一位诚实热情的老太太，夜间一听我们到了，就赶紧起来，给我们开门，点松明子照亮儿，把炕上睡得着的孩子挤了又挤，腾出个容身的地方，安置我睡觉。崔盛、李景芳实在挤不下了，就叫他俩到炕里打横睡。其实宋大爷的这个“房子”，只是上盖苫草的地窖。所以尽管敌人反复围攻、扫荡，而没被发现烧掉。

大红峪没水，每隔几天，得在深更半夜到小口外去抱

冰。站人电杆的“剿共自卫团”一听到动静，就筛锣追喊。李景芳一来，我们人多主意多，工作上做了分工。常常是李景芳上山放哨，崔盛在山坳里碴粥。做饭的“锅”是李景芳从一家猪圈里找来的，原是用做喂小猪的一个日本鬼子钢盔。这一来，腾出我的手脚，找个背风阳坡写稿件，划钢板。

连日来，几路敌人不断扫荡大红峪一带，山里住的老百姓越来越少了。桑树鞍只有党支部委员李福贵俩口和李福才、李福江了；大红峪就剩东沟的宋大爷一家了。一时消息不通，四外情况不明。天色已晚，川芳峪据点的敌人盘据在厝牙峪山梁，一声一声地打着冷枪。这时阴云布满天空，习习的寒风吹撒着雪花。大红峪、桑树鞍上空笼罩了阴沉惨淡的景象。我同崔盛、李景芳默默地坐在大石磬的一家房碴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敌情：估计明天几路敌人仍要向这一带山地分进合击，搞什么所谓的“淘干拿鱼”、“梳篦战术”。如何应付这一环境，成了我们的紧迫问题。当时我提议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方能保得安全。可是往西的下营川、往北的白滩川敌人日夜活动，非常猖獗；况且人生地不熟，瞎闯乱撞会遭到打击。后来崔盛说：“过西梁就是苦梨峪，离下营虽然比较近，敌人却不注意。”李景芳表示赞成地说：“对，那里还有几家房子没烧，找个地方扎两天，也许就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苦梨峪！”这个地名在我的记忆中并不生疏。我小时听说过：我村有一户贫农，名叫张福才，因被生活所迫，全家搬到苦梨峪开荒种地。但不知现在他家生活得怎样？如能相遇，盘论起来，不是很好的关系户吗？我想到这儿，同意了他俩的意见。于是三人马上起身，

崔盛前头引路，盘上西梁。

夜幕沉沉，天已大黑。我们来到苦梨峪，果见几家房子依然存在。可是已用土坯堵了门窗，人已不在了。后来在南沟找到张福才的侄子——张连科，他告诉我，全家都被敌人圈到下营，住在大庙里。他同七叔张福才在山里照看房子。并说，七叔背一捆柴草刚下山。他说着话，不住地打量我，看我大长的头发，穿一件荆棘撕坏的棉袄，腿上仍穿着夹裤，两脚穿的鞋，头露脚趾，后露脚跟，鞋底、鞋帮缠着麻绳、布条。惊异地问：“三叔，您咋闹成这个样子？”我一笑地说：“抗日嘛，就得有点艰苦性。别看我这样儿，咱八路军大队在边北打了不少胜仗，没多久就过来。”他说：“三叔，先甭说这些。三九大冷天，凭您这身穿着，架得住吗？”说着要给我脱下他的棉袄。我急忙上前拦住，然后要求他抽空儿下山，向我老妈要一身棉衣和一双夹鞋、袜来。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安置我们住在他家。

敌人一连几天的围攻扫荡，象刮了一阵狂风，又暂时过去了。张福才冒着生命危险，从我家取来棉衣、鞋袜。听他说，敌人在村北挖了“防共壕”，安了据点，“剿共自卫团”日夜巡逻，迫害抗日家属，实行政治诱降，门前插了小红旗，叛徒、特务拉帮结伙不时进家搜抄……种种阴谋毒辣手段一言难尽。他带来我老妈殷切地嘱咐：“敌人找得很紧，千万别慌家，只要好好的，比啥都强。”这一坚定而忠贞的母训对身在极其艰巨处境中，坚持地区工作的儿子，是多么大的精神力量支持呀！

腊月十二已是1943年的1月中旬了。县委高昌同志派来两位交通员调我去边北。临别的时候，我同两个最亲密的革

命弟兄——崔盛、李景芳紧紧地握手，久久不能言语。最后，我说：“你们多多提高警惕吧，坚持到底。”他俩也关切地说：“只管放心，祝你一路平安，以后总会有见面的日子。”大家眼含热泪分别了。我走出老远，回头望见他俩仍呆呆地伫立在山坡，相互招了招手，我怀着留恋不舍的心情踏上了新的征途。

《救国报》 漆西分社

（一）福吉卧的春天

1944年2月，春节已过，和煦的阳光照射着解放区的崇山峻岭和蜿蜒的万里长城。满山满谷暖洋洋，大地回春，万物向荣。党组织从各地调来的同志，奔向福吉卧络绎而来。同志们相见，有的旧相识叙叨叨拉起阔别之情，驰骋山南地北，又到一起工作了；初次见面的谈话之间，彼此倾慕，互相勉励。人人春风满面，喜笑颜开。《救国报》漆西分社在这欢悦的日子里诞生了。

当时，条件简陋，只两部油印机和一部简易电台，而人员编制已粗具规模，即：编辑室，主编高昌和见习编辑陈大光；电台，报务任和家、张景福，还有背电台的郭福堂、包万海；译电组，杨晓峰、苏健和张文清；刻印组，王雪松、墨耕、国章、新华、徐耀青、华东、王绍文、刘志远；交通班，李俊仙、木易、程贵等四人。再加上警卫、伙房共有三十多人。

创刊号头版头条的发刊词，通栏红版大字，下面刊登了寓意深远，书法流畅的三幅题词：

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李子光题“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流风余韵直至于今”。

军分区司令员舒行题“唤起民众，同仇敌愾”。

地委宣传部长方治平题“党的声音，群众的喉舌”。

第二版登载了新华社和冀热边特委指导当前工作的文电及地方消息。一般情况，每周出刊二、三期。从此，《救国报》滦西版活跃在冀东西部各县，第一地委党政机关及解放区抗日军民及时看到了上级指示和我军作战的胜利消息，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可是，办报的这些同志都是外行，主编高昌写一篇社论，总是改了又改，还嫌内容不够充实明确，见习编辑陈大光手头连本最简单的小字典都没有，遇到不能肯定的字，往往要征询几个同志，才能定下来。排版计错了字数，重新更动版面，影响出报时间，高昌要求很严格，指着排错的版面批评说：“搞新闻工作，时间就是胜利。版面排错必须改正过来！处于当前环境，出一期报纸不容易，稿子来得更不容易，要比你排版的代价大得多！……”为改版，争取及时出报，陈大光经常深夜不眠。她边干边学，不断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后来改用格纸排版法，做到字数准确，标题主次分明，提高了工作效率。

译电组的杨晓峰是一位举止大方娴雅温厚而且工作细心负责的女同志，她为及早掌握译电技能，每天起早带动全组同志背诵电码。工作时手不离电码本，当时，敌台常干扰我方电波，致使抄出的电码发生差错，她的身体本来不好，可是不顾疲劳，常译电到深夜，反复查对将错码更正过来，所译电文准确通顺，给编辑工作提供了方便。

杨晓峰比一般同志年长两三岁，都尊敬地称她“大姐”。当时解放区在敌人重重封锁之下，物质条件极其困难，五月间，男同志还身穿棉衣，换不下季来。她向男同志要去棉衣，同几位女同志一起劳作，掏去棉花，拆洗缝补，改成夹衣。在那峥嵘的岁月里，同志间患难与共，血和汗凝结的诚挚感情亲如同胞姐弟。而同志们这种精诚团结，带来无比强大的战斗力。

同时，同志们与当地群众关系也搞得很密切，男同志给房东挑水，上山打柴，春忙抢种；女同志扫院子，做饭，并用节余下来一点粮食帮助群众度荒。而群众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这村的办事员张贵林，排行老五，都称他“五哥”。夜晚转运战勤物资，非亲身出马不可；给报社掩藏纸张、油墨、油印机……件件主动承担任务。张贵林的四哥张贵臣负责民兵和治安工作，他从几年的战斗经验中，灵活机动地掌握了民兵战术。为保障报社安全，岗哨放到北寨长城口，警戒平谷、胡庄等据点敌人；各山头布置了民兵传呼哨，发生敌情传递呼喊，顷刻之间，消息传到福吉卧，真比电话还灵通。

有一次，单德贵的叛徒队从西梁直扑福吉卧来。张贵林大枪一背，领我们藏进东沟山洞里，然后上山同民兵一起跟敌人打麻雀战。张贵臣带民兵在要路口、各家房间、院落摆好地雷阵，部署民兵抓上东西两山。敌人闯到福吉卧时，只听“轰，轰……”地雷、手榴弹连声爆炸，敌人在一片片弥漫的硝烟中炸得迷头转向，抬着死尸、伤兵狼狈逃命。哪知刚到北寨长城口，东西两山民兵集中火力，兜屁股一阵泡儿枪，打得这帮丧家狗的汉奸队狼号鬼叫，抱头鼠窜。

敌人逃走之后，我们从山洞里出来，只见福吉卧各家的场院里里外外，留下了一摊摊的血迹。最可笑的是：张贵臣在摆地雷阵时，他把个手榴弹捆在草捆里，弹弦拴在木橛上，敌人抄起草捆要用来点房子，忽然“轰”地一声巨响，草捆里的手榴弹爆炸了。那家伙随着腾起的硝烟、石块，被炸得血肉横飞。张贵臣用棒子秸苫盖的房子——报社印刷室，到了几没被烧掉。军民鱼水情深，团结战斗，在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开展我们的报纸工作。

一捆捆油印报纸就从张贵臣家里印发出去。一天夜里，寒风呼啸，屋顶上搭的棒子秸“哗哗”地响。小屋里到处透风，吹得半明不暗的花油灯，火焰摇曳不定。印刷的同志手拿油墨辊，印几张就得把辊子放在火盆上烤一烤。忽听印刷员徐耀青说：“干啦，糊蒙子了。”我急忙过去一看，印过的报纸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又听那边正在印刷的华东也喊道：“油墨变质，印不透了。”两边的喊声使我顾左顾不了右，心里一急，豆粒大的汗珠不禁从额角流下来。因为这期报纸刊载了重要文章，报纸印不出字来，要耽误事。说话时间已快半夜了，明天一早报纸发不出去，咋办？大家都在着急。我叫印刷同志将蜡纸赶轧干净重新敷墨，并亲自到山洞里查看油墨。谁想，所存的十几合油墨都因隔夏受潮，沉淀变质，不好用了。没别的办法，只好用煤油将墨调稀勉强使用，印出来的报纸字迹跑油，黑糊糊一片，一连几期都是这样。

地委书记李子光经常随部队到北平、通县、顺义等地开辟并恢复地区工作，他不时送来反映新区情况的稿子，每期报纸他都认真阅读，指出报纸的优缺点和改进意见。报纸印

刷质量很差，写信批评我。同志们一见李子光的信，同样心急如焚。

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油墨问题已成燃眉之急了。同志们对这事纷纷议论，出主意，想办法。有的提出创造土法，自造油墨。为此，我曾走访一位曾在三河开过石印局的老师傅。他向我介绍油墨的墨料得用油烟，调和剂须用松节油或四号油。可是到哪里去找呢？后来集中了刻印组同志在日常工作中，摸索出来的点滴经验，经过反复研究实验，用花生油溶入松香粉和樟脑粉来代替松节油，并将同志们夜间工作点的花油灯，用纸罩收集灯烟做墨料。但因调和剂的成分掌握不准，松香少了，印出的字迹跑油；松香多了，就印不透。李子光得知自造土法油墨的消息，对我们进行鼓励并给予物质支持，还特到报社来检查自造油墨的情况。恳切地指出：“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革命问题，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要继续发挥创造精神，总结经验，一定把土造油墨搞成功。关键问题必须反复实验，搞出剂量准确的配方。”遵照这个意见，终于搞准了配方，按量下料，制出的土造油墨总算能逐期印出字迹比较清晰的报纸了。

四月初，任朴同志从《救国报》总社调来任编辑，他性格沉静。工作细致，语言幽默而诙谐。常常一两句话，逗得大家笑不拢咀，给滦西分社增添了活跃气氛，并带来了办报经验，报纸质量显著提高。一有空儿，他喜欢找同志聊天。所以到分社不久，就掌握了同志们的情况。刻写员墨耕同志在1943年，坚持平原“蚕食”区工作日夜钻洞，一年之久不见阳光，以致营养失调，体质虚弱。但是，工作很认真，耐心学习刻写。所刻的蜡版笔画工整，字迹端正。任朴在一次支部会上对墨

耕的工作表现和成绩进行了表扬。并指出，“身体就是革命的资本，积极工作，还要注意身体健康”。这次既有表扬又有批评的谈话，全体同志都深感温暖热情。后来，弄了一个旧篮球，在工间精神疲倦的时候，同志们跑到大场欢蹦乱跳地打上一场球。然后，连说带笑地又回房工作了。任朴同志在滦西分社工作四、五个月，冀热边特委调他去做城市工作。同志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送别了他。

（二）从新开峪到八里沟

1944年夏天，全国各个解放区突飞猛进发展，冀东西部形势也随着全面好转。五月底，福吉卧东的长城要隘——黄松峪据点敌人被迫撤退；八月初，平三蓟联合县游击队和民兵将胡庄据点团团围困。平谷敌人孤立无援，闭门不出；蓟县平原基本区也得到恢复，盘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日益活跃。

这时候，《救国报》滦西分社的同志们，辞别了福吉卧的乡亲，向盘山附近活动。编辑室、刻印组转移到新开峪，电台、译电组住在酸枣峪。刻印组的国章调走了，调张明五做刻印员。时当暑夏，晚饭后，高昌我们借在街头乘凉机会，向乡亲们宣讲国际、国内大好形势，拉到高兴时，村中有善音乐的，从家里拿出各种乐器。高昌会拉二胡，我能吹横笛，索性开起了文娱晚会。象扭秧歌、句句双、小开门、龙灯舞等活泼愉快的乐曲，都是我们的拿手节目。招得男男女女围了一大圈儿。当大家扭秧歌时，一轮明月升上山头，银白的月光洒遍这愉快的山村。儿童团打开场，按音乐的节奏，扭扭搭搭地走起秧歌步，音乐奏得起劲，秧歌扭得更欢，一阵阵欢声笑语和掌声震响了山谷。当时，新成立的滦

西影社也来新开峪演出皮影戏。主要剧目有影社社长韩怀清编的除掉汉奸大快人心的《枪毙杨山》、誓死不屈，壮烈牺牲的《女烈士张月》；高昌根据《说岳全传》摘选改编为国尽忠的《王佐断臂》。间或也演些传统剧目《五锋会》、《蝴蝶杯》。从而丰富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增强了民族气节教育和同仇敌忾的斗争意志，所以影社深受群众欢迎。

入秋，抗日游击区迅速发展扩大，敌人濒于死亡前夕，拚命挣扎。凑集伪满军八个大队，约计三、四千人配合地方伪军，向平谷川、福吉卧和鱼子山一带山地进犯。高昌按照地委指示：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我以地理熟悉的条件任向导，带领墨耕、新华等同志连夜突过福吉卧北大梁——南顶，越过长城四座楼，钻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北水峪的崇山峻岭，跟敌人周旋半个多月，敌人围攻撤退了，我们又安然回到原地。不料，在这次反扫荡中，刻写员张明五称病未离开新开峪而被捕了。滦西分社所在地既已暴露，于是决定转移八里沟。

八里沟地处白洞、段甲岭北山，西邻前后蒋福山、栲栳山等抗日工作基础较强的几个山村，往东登上老爷岭与盘山相望，北出旱石龟沟就是平谷夏各庄。这里山不高，林不深，却是一处不引敌人注意的幽僻地方。分社迁来已是九月份了，编辑室住八里沟，电台和译电组住八里沟南上坎，刻印组住在八里沟东北相距四里地的大岭后。这时，高昌回地委宣传部工作，高元由《救国报》总社调来任主编。陈大光、王又民和我任见习编辑。我仍在刻印组兼负责版面工作。张景福调出报社；先后调来任子易、高壮飞负责报务。